



星期三
2023年3月8日



检察变革五年：一路前行

上接第一版

开局关乎全局，起程决定进程！“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这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根本性要求，是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发出的最新动员令。

党的二十大特别强调“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完善公益诉讼制度”。这是新时代新征程大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依法治国、党的检察事业发展作出的历史性、战略性部署，赋予检察机关更重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检察责任！

大局至简，实干为要。

2018年2月，设立了23年的反贪污贿赂总局完成了历史使命，正式摘牌。四级检察院反贪、反渎和职务犯罪预防部门职能、机构及44151名检察人员全部按时完成转隶。

那一天，故宫东侧的北河沿大街147号，随着几辆大巴车的远去，那块当年按照张思卿检察长建议以最高检牌子短5厘米、印有金色仿宋字“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的花梨木门牌永远地留给了历史与过往。

转隶后，检察院引以为荣的“重要职能”没有了，很多检察官情绪低迷，有些不知所措，工作进入低谷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8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新任检察长张军正式上任了。

“转隶关上一扇窗，我们应该更有信心开启新时代检察工作的另一扇门”。新一届最高检党组对全系统发出动员令。2019年1月3日，国新办举行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被誉为检察院恢复重建以来规模最大、调整最多、影响检察全部职能作用的“四大检察”第一次亮相。以机构检改革为突破口，实现公益诉讼检察独立，未成年人检察独立，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协调发展的新时代法律监督新格局基本形成，一场“动筋骨触灵魂”的重型变革正式拉开帷幕。

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次历史上并不多见的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的改革？张军代表最高检党组作了坚定的回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更高需求，不仅要在刑事案件中深刻感受，更要在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公益诉讼案件中充分感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童建明介绍，“长期以来以反贪、公诉为重心形成的‘三大不平衡’已经成为检察工作发展的掣肘，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刑事案件一头沉的格局，以‘四大检察’‘十大业务’的全面充分协调发展推动检察工作满足新时代新需求”。

还记得改革初期关于“捕诉一体”机制的那场讨论吗？据说至今还有人无法释怀，犹如一根“刺”卡在喉咙里。反对者认为，“捕诉一体”势必大大削弱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力度，一个人决定“捕”和“诉”，一“诉”到底，将不利于保障人权。赞同者认为，反贪反渎已经转隶，检察机关内部的左手和右手怎么形成监督？不过是身子进入新时代，思想停留在过去的固执已见而已。

2018年春天第十九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会年的前夜，张军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就“分”与“合”曾有过长达三个小时的“促膝谈心”，最后陈卫东作为学界代表表示不反对试点。本以为这件小事只可能会不可言传，没想到第二天张军讲话时毫不避讳主动提及最高检已经关注到学界的不同看法，同时特别提及与公安部某领导的一次对话，透露改革也是因为公安系统领导对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工作有更高期盼。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贺恒扬，当过公诉人，当过地市级检察长，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老检察官，他对记者讲述了一段往事。那年，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专门到最高检汇报工作，和张军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恒扬，你是老检察官了，对于‘捕诉一体’怎么看？”

“我完全赞同。”

“那你们重庆先搞试点可以吗？”

“我们已经在先期试点，回去马上落实。”当天晚上，他就用手机记事簿拟了进一步推行“捕诉一体”的想法，回重庆后和党组书记商量开始了准备工作。作为试点单位，重庆检察机关率先完成了内设机构改革。

据了解，在最高检全面推行“捕诉一体”办案机制前一年，北京市部分区检察院的

轻罪案件、金融、知识产权等案件办理早就先行运用“捕诉一体”机制，积累了成功经验。

至今年，检察机关推进“捕诉一体”改革，完善检察机关运行机制已经五年，具体成效如何呢？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国庆介绍，刑事检察实行“捕诉一体”，按照案件类型重新配置刑事检察职权，办案质效明显提升，2022年退回补充侦查比2018年下降80%，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下降95%以上。刑事诉讼监督成效显著，与2018年相比，2022年不捕率从22.1%升至43.4%，不诉率从7.7%升至26.3%，为有司法统计以来新高。公安机关对不捕不诉提出复议复核，当事人提出申诉反而分别下降63%和25%，获益的是老百姓更实获得感。

陈卫东对改革成效由衷赞叹，发自内心的说：“超乎想象！”赞成者关于“捕诉一体”可以形成法律监督合力的“拳头理论”得到了实践的验证。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机制运行初期的确出现过侦查监督数据不正常下滑，各地检察官也真切地经历了不适应的手忙脚乱，但最高检更新树立“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理念，压实责任、强化考核，研发线上侦查监督平台，显示侦查监督力度的数据在2019年下半年开始企稳回升。

2021年，最高检与公安部联合下发《关于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意见》，共同设立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系统加强公、检两家的监督、协作和制约，以更有效的监督、更密切的协作促进侦查办案质量提升。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表示，2022年检察机关监督侦查机关立案和撤案数据同比分别上升，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促立案3.7万件，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撤案4.6万件，自行补充侦查延续近年来大幅增长态势。2022年自行补侦数是2018年的266倍，公诉质量提升，撤回起诉和无罪判决率则均呈下降趋势。

在民事司法实务中，民事检察监督被当事人视为权利救济的“最后一根稻草”，作为民事检察监督中最为基础、也最为核心的一项业务，民事生效裁判监督集中体现检察机关在民事法律适用、司法理念方面的纠偏、引领作用，有助于推动民法典的正确施行、统一司法裁判标准。

为了解决长期以来重刑轻民、民事监督疲软未能充分发挥作用问题，民事检察作为“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亟需“破茧成蝶”。

“办理一案，带动一片，促进解决一类问题”。张军检察长“通过精准监督带动类案监督”的理念给最高人民法院选调的第六检察厅厅长冯小光留下深刻印象。

“聚焦典型引领性案件，具有司法政策创新性的案件，抗一件可提供下级检察机关和更多司法机关办理同类案件今后参照办理，这就叫精准。”冯小光表示。

冯小光介绍，最高检精准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持续推进正、副卷一并调阅制度和全国执行与法律监督工作平台建设，指导各地民事检察部门不断探索推进民事支持起诉、虚假诉讼监督、民事检察和解、民事检察听证等新领域、新行为的检察监督，正在培育民事检察监督、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新的增长点。

记者认真梳理后发现，相较于“四大检察”的惊艳亮相，刑事执行监督的部署最早，这可能与张军担任司法部部长的经历有关。他在担任司法部副部长调研时，一些监狱局长反映派驻检察官有的把多名亲属安排在自己系统，扫除除恶斗争中的小因果、郭文思案、巴图孟和“纸面服刑”案，更显示检察机关监督存在形同虚设问题。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厅厅长侯亚辉介绍，2018年5月，最高检针对派驻监狱检察人员相对固定、监督敏感性不强甚至被同化问题，创新试点对监狱巡回检察工作机制，改“派驻”为“派驻+巡回”。半年不到，2018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巡回检察制度被纳入，最高检贯彻执行中，又创新开展从省内再“跨省”交叉巡回检察，促进长治常效。

小凡(化名)，54岁的父亲因中风瘫痪在床十余年，妈妈和妻子没有工作，家里还有一名年仅7岁的儿子，靠着经营小旅馆每天30元至100元的收入，日子虽然紧巴巴，还算勉强过得去。

意外，在2022年的夏天，如一道闪电“击碎”了小凡那清贫但温暖的家。

2022年5月某日晚，被告人付某(已诉)在当地酒吧喝酒时与吴某发生口角并引发斗殴，两人分别打电话喊人到场助阵。作为吴某的朋友，小凡等人赶到酒吧，与对方互殴，并在互殴过程中使用了啤酒瓶致人受伤，警察到场后双方人员逃散。7月26日，小凡因涉嫌聚众斗殴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被批准逮捕。

2023年1月，当大多数人沉浸在新春将至的喜悦中时，小凡妈妈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小凡父亲出现在检察长和案件承办检察官面前。小凡妈妈哭着诉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小家生活的艰难，希望检察机关能为儿子变更强制措施，不致影响家计。

根据当事人亲属的申请，检察机关于当日启动了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全面审查案件后认为：小凡本人安分守己，无违法犯罪前科，参与斗殴只是出于哥们义气一时糊涂，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小凡自愿认罪认罚，真诚悔罪；同时，经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对小凡采取非羁押措施不具社会危险性。2023年1月20日，除夕的前一天，小凡被检察机关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

卯兔新春，正月十二，空气里烟花爆竹的烟气还没消散，记者来到距离南充一百多公里镇上小凡的家。屋子有些凌乱，父亲躺在床上不能说话，电视旁散落着孩子的金箍棒、小汽车，我们刚坐下，一个小男孩拿着一张粉红色的信纸双手递给了检察官小陈，稚嫩的笔迹歪歪扭扭地写着：“谢谢jū ā n ch ā 官叔叔阿y i，让我爸爸回来陪我！”问他几岁了？回答七岁。我们想让孩子回房间里去玩，孩子含着泪嚷嚷着不愿离去。

在检察官结束与小凡的谈话下楼时，小凡妈妈悄声对记者说，“小凡错了就是错了，应该受到惩罚。好在检察院年前让他回来，现在邻居还不知道小凡的事儿，不然这个春节我们谁都抬不起头”。

记者了解到，小凡之所以能被变更强制措施，得益于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落实，得益于最高检自2021年7月部署开展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专项活动。

2020年，最高检工作报告匠心独运，首次通过20年来刑事犯罪结构变化解析“两大奇迹”背后的法治密码：从1999年至2019年，我国刑事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严重暴力犯罪持续下降，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子上升到85%左右。同时，自2018年10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正式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来，在全国司法机关的不懈努力下，刑事案件办理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率逐年上升，近年来都在90%以上，犯罪嫌疑人认罪服判成为常态。两方面因素叠加，较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险性在整体上大大降低。

刑事犯罪结构发生变化，司法政策必须与时俱进。为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彰显中国特色刑事司法制度的优势，最高检适时提出“少捕慎诉慎押”检察办案理念：在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罪的同时，对大多数犯罪情节较轻、初犯偶犯等依法从宽处理，严格把握逮捕、起诉、羁押标准，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可押可不押的不押，促进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悔罪，减少社会对立面、厚植党的执政根基，增进社会和谐因素。

2021年4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将“少捕慎诉慎押”正式确立为我国刑事司法政策，写入2021年工作要点。随即，最高检部署开展了为期半年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专项活动，并于2022年初将专项活动延长至2022年底，要求各级检察机关扎实推进，对确无羁押必要的，依法及时变更强制措施，减少不必要羁押。

专项活动主要针对实践中存在的轻罪案件羁押率高、构罪即捕、一押到底和涉民营企业案件因不必要的羁押影响生产经营等突出问题而展开。苗生明表示，“过度适用羁押措施背后所反映的以押代侦、以押代罚、逮捕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标准虚置等问题已经不适应犯罪治理现代化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21年全年，检察机关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17.7万件次，是2020年的3.3倍；2022年全年，检察机关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数已达25万余件次，比2021年进一步增加44%。两年间，有9万名未决羁押人员变更为取保候审等非羁押强制措施。

“通过专项活动，确保各个羁押环节准确适用、及时变更羁押强制措施，对健全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意义非凡。”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周光权如是

评价。

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赵运恒认为，以羁押为原则、以取保为例外的状况发生根本性改变，既有利于更好实现司法公正，也有利于通过大幅度降低羁押率降低司法成本。记者采访时获知，在政法各机关的共同努力下，作为司法文明重要标志和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落实情况重要指标的诉前羁押率，已经降至新中国历史的最低点，仅为26.7%左右，我国的强制措施适用体系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

一位熟悉我国司法、刑事诉讼制度的老领导肯定地说，这样低的羁押率，政法机关认识统一，老百姓、特别是受害方也认同，根本还是社会治安稳定，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更实、更强烈。

那么，少捕慎诉慎押是否意味着可以不捕不诉不押？陈国庆特别强调，少捕慎诉慎押绝不等同于只讲从宽而不讲从严，绝不是“一宽了之”“一轻到底”，任何时候不能顾此失彼，对犯罪性质恶劣、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案件，依法该严必严，绝不手软。2022年9月23日，备受关注的“唐山烧烤店打人案”一审宣判：主犯陈继志获刑24年。这既是公平和正义的彰显，也向社会释放出依法严惩黑恶势力犯罪绝不手软的强烈信号。在这起社会高度关注的案件中，检察机关依法审查，从快批捕，从严追诉，同时坚持实事求是的法治原则，对证据证明没有参与打人的两人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体现了“是犯罪决不放过，不是犯罪绝不凑数”的办案理念，积极回应着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呼唤。

Z公司坐落在上海市普陀区，是一家主要为本地商户提供大数据技术服务的企业，拥有多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曾被上海市科委评选为高新技术型企业。2019年至2020年初创期间，为经营需要，在未经授权许可的情况下，首席技术官阿亮(化名)和多名技术人员通过爬虫程序，非法获取某生活服务平台涉案企业纳入监管平台。在为企业体检做好精细“手术”，让企业“司法康复”后，2022年5月，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对涉案的14人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我内心最愧疚的是1000多名员工，他们大部分是985、211大学的高才生，这么多人有违犯罪公司案的经历，职业生涯也就断了，这件事情想想真的后悔。”2月9日，记者在上海采访时，Z公司CEO李总如是表示。

被不起诉人阿亮有一个7岁的女儿，在向记者说到这次在看守所待了30多天、堪比过山车的经历时，他仍然痛悔不已。“这件事对我的教训将终生铭记。以前并不了解企业合规，经过这一次总算知道，这项改革既可以防止企业犯错，也可以挽救一个企业，还能避免不是恶意的个人和家庭因此遭受灾难性后果。”

李总阿亮得以释怀的是，团队中那个95后的小姑娘玲玲(化名)，在被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已经顺利回到学校读研究生。

玲玲是她们村唯一的大学生，当知道我们公司出事时，村里的亲戚们都蒙了，如果真的因为公司的事耽误了她的前程，真觉得没法面对她和她的乡亲们！”李总补充道。

据了解，经过合规整改后，该公司实现了从“爬取数据”到“以合法方式购买数据”的转变，与4家大型互联网企业签订了数据交换协议，服务本地商户数字化转型达5000余家。2022年营收增加1.6亿元，纳税2000余万元，为700多名技术人员提供了新就业岗位。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强调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环境，为深入贯彻“两个毫不动摇”，防止办了案子堵了厂子，检察机关很快拿出11项具体政策，强调严格区分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产权纠纷与恶意侵占、个人财产与企业法人财产等，要求审慎采用限制人身和财产权利的办案强制措施。

与此同时，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有的涉案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因负责人被迫

诉、判刑后无法正常生产经营，甚至导致企业破产倒闭、工人下岗。“案子办了，企业垮了”。怎么办？最高检明确提出：对一些涉企、涉及生产经营领域的疑难、复杂、影响性案件具体处理有争议的时候，要落实好“从政治上上看”，怎样处理更有利于保市场主体、稳就业；更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更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国家的长治久安。

2019年10月18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首场专题讲在北大开讲，张军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为主题，与300余名北京大学师生热烈互动，共话法治。也是在这个讲堂上，最高检首次释放“对企业经营类犯罪，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提出适用缓刑建议”的强烈信号。

“检察机关要当好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老娘舅’！”张军生动的阐释，引起企业家、学术界共鸣。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尤其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最高检党组敏锐地意识到，服务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就是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经过研究论证，最高检决定自2020年3月起，在10个省份检察院开展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

2022年1月17日，全国检察长会议上明确提出：“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今年3月第二批试点结束，最高检将总结经验，在全国检察机关全面推开。”又是“一阵春风”吹向民营企业。

检察机关涉案企业合规改革采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的模式。两年多来，在各方面支持下，探索建立了一套企业合规运行机制。特别是2021年最高检与财政部、国资委、全国工商联等8部门共建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随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应急管理局、海关总署、中国证监会也加入该机制，使得企业合规的领域更宽、合力更强。司法、执法、行业监管携手促进“严管”制度化、防止“厚爱”被滥用。

记者了解到，面对市场主体9成以上是民营企业 and 中小微企业这一现实国情，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探索着中国式企业治理司法道路，让一批因经营涉案、危害后果不严重的企业卸下包袱，再获重生，对于稳住经济基本盘、保就业、稳增长发挥了重大积极作用，推动着经济犯罪检察履职由治罪走向治理。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昆指出：“企业合规改革是惠企利民的好政策，有利于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是维护企业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显明认为，这是一项集末端治理与前端治理于一体的履职创新，有利于促进涉案企业守法经营、预防再犯，同时警示其他企业，促进诉源治理。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表示，在试点之初，最高检就始终强调“严格依法”这条红线，要求现有探索都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从一开始就让这项制度“合规”、稳健。同时，为加强规范指导，最高检还创建了企业合规工作指导机制，及时出台《关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中案件办理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确保改革试点依法规范、稳妥开展。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厅长张晓津介绍，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2022年4月改革试点全面推开后，检察机关累计办理涉案企业合规案件3825件，办案数量较改革的前两年增长了3倍。截至2022年底，检察机关共办理合规案件5150件，其中适用第三方机制案件3577件，对整改合格的1498家企业依法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每一个典型案例的制发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这一案件体现的对公共利益的修复，落脚点人民群众的感，这充分回答了人民司法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重大命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程雷在最高检第四检察厅挂职副厅长一年，亲身参与了这项改革的多项重要工作，自然有着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不一样的感受。

福建人小姚(1984年出生)，2013年经媒人介绍与广西姑娘莫某相识，由于家里和自身条件都不是太好，亲戚七拼八凑7万元彩礼后，见面第二天小姚就与对方领取了结婚证。拿到钱后，莫某提出要回老家顺便去邮局把户口本寄回去，小姚憧憬着未来，陪着前往。

那那部局人多，莫某说她出去透气气，再无踪影。小姚四处找寻无果后，以被诈骗为由先向公安机关报案，因证据不足未予立案；向民政局申请撤销婚姻登记，因无“法定胁迫”情形不予受理；先后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申请宣告婚姻无效、诉请撤销婚姻登记，均因不符合相关规定不予支持。

7年奔波，五次诉讼，无助诉诸于法的小姚一次次被“依法”推拒，一家人的生活跌入“万丈深渊”。后来小姚与阿莲相识相爱，因已有“婚姻”而不能合法共同生活，育有一子，又因不上户口而不能正常入学，生活进入了“死循环”。小姚一切程序走过，最后申诉到检察机关。了解全部情况后，办案检察机关以检察建议促使原婚姻登记被依法撤销，并监督公安机关刑事立案。

“检察机关要当好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老娘舅’！”张军生动的阐释，引起企业家、学术界共鸣。

这是典型的法律只有原则规定，当涉及人民群众急难愁盼“不明确事项”时不易解决的案例。检察机关要不要、能不能、敢不敢履行“兜底”职责，以履职“我管”促依法“都管”，检验的就是人民检察院是“人民至上”还是“但求无过”，是口号震天价响还是真正为党为民排忧解难。

“按程序办”决不能骗为“程序空转”“结案了事”。最高检反复强调：越是小案越贴近民生，检察机关办案案件时更“止于至善”，努力解决好老百姓的愁心烦心事。

为了早日打开小姚案“死结”，福建检察机关按照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路线图”机制，由省市区三级检察院组成办案组联动化解。

闽侯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春介绍，他们在向县民政局调取婚姻登记档案材料时，通过全国婚姻信息联网查询系统，发现莫某还在山西等5个省份有5次婚姻登记信息，这让他们信心倍增，如果能够确定诈骗事实，就能促使民政部门打清顾虑。

福建省市区三级检察院组成办案团队跨越1800多公里，辗转山西多地市走访民政局、公安局、档案馆等单位取证，几经周折，初步证实莫某曾在山西冒用他人身份登记，实施网络诈骗犯罪，最终促成刑事立案。在此基础上，召开公开听证和专家论证会达成共识，依据《福建省行政处罚条例》自行制定规定向民政部门发出检察建议，案件办理迎刃而解的转机。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法治日报》记者曾详细报道该案，引起各方高度关注。那么，小姚现在的生活又有怎样的改变呢？2023年1月29日，记者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厅厅长张相军、办公室主任冯孝科，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金文、七部主任吴世东、副主任王斌一行再次来到小姚家中。

记得去年小姚租住的老房子，窄小得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弯腰侧身才能进去，一打开窗户，邻居家养鸡鸭的混杂气味立即灌进屋里。而小姚自己的家，在闽侯更偏僻的大湖乡东姚村，这是一栋二层的旧砖房，前后院共住了十几户人家。房子空间不是很大，墙壁上白石灰已经脱落，但映入眼帘贴满墙壁的孩子奖状平添了未来的希望和生活的温馨。

更让人欣喜的是，当年那个有些木讷、不善言笑的小姚脸上已经绽放出光彩，孩子们手里拿着检察官带来的慰问礼品和儿童玩具时，开心的笑容在夕阳下显得那么灿烂。当记者问小姚：“你到底多高啊？”妻子阿莲抢答：“1.48米。”儿子咯咯地笑出了声，空气中仿佛都飘散着那份满足幸福的气氛。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莫某因诈骗罪已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有期徒刑，同时公安机关通过进一步深挖彻查，已将莫某多地流窜作案的其他同伙抓获归案。

行政检察就是要始终坚持与民同行、向民而行，依法能动履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针对小姚案反映的问题，最高检没有止步于个案，要求全国各地检察机关清理类案，积极开展监督，真正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

张相军对记者表示，检察机关会同民政部门排查发现全国至少有一千多起类似案件。2021年底，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制定并发布《关于妥善办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以诉讼治理打通司法与行政的堵点，从制度上解决冒名顶替或以虚假方式婚姻登记给受害人带来的“灾祸”。

下转第十版